

# 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

## ——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朱迪

**提要:**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福利的研究相当丰富,但是缺乏对于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质量和个体生活质量因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包括福利获取的多种途径——市场、国家、环境和个体,以及不同获取途径所主张的规范价值——竞争、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在此框架下,本文使用 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收入和人均 GDP 等市场竞争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集体消费也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引入客观环境指标后,主观环境评价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只有将发展模式由 GDP 主导调整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推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治理等制度政策的改革,才能保持居民生活满意度平稳上升。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 市场 集体消费 公平 环境可持续发展

GDP 曾经被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保障人类福利的最重要指标。这本质上是市场主导的路径,强调市场交换的产出及其配置资源的作用,其价值取向也主要是竞争性的。但是有证据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会提高。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间,中国的人均 GDP 以不低于 8% 的年均速度增长,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呈现出 U 形的变化趋势。通过比较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盖洛普公司、零点公司、亚洲指标调查数据库 (Asiabarometer) 和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的纵贯数据,伊斯特林等 (Easterlin et al., 2012) 发现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从 1990 年开始下降,一直到 2000 - 2005 年期间才出现转折,随后又呈上升趋势。

面对这种矛盾,国际社会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集体消费对于生活

---

\* 感谢李培林老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感谢崔岩、田丰、王晶、陆晶婧、李凌、尤婧等同行友人对数据分析的建议,感谢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

满意度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注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支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资源分配中的公平与公正。集体消费指产品和服务由国家、城市、社区等“集体”供给,以分配作为主要摄取方式,比如公共住房、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Castells, 1977; Warde, 1990; 王宁, 2014)。人们对于集体消费的参与及评估是提高主观和客观福利的重要因素。除了从市场和国家那里获得福利之外,人们也从环境中获取福利。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大都以环境资源的“消费”为代价,造成了一定的生态后果,成为影响人类福利不容忽视的因素。“福利”与“环境”被捆绑到了一起,学界近年提出的“主观福利的环境效率”(Dietz et al., 2009)等话语即是倡导人类福利与环境消费之间的平衡。

已有研究比较关注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强调从学科角度出发的经济、环境等单方面因素的作用,缺乏对于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本文提出了一个主要由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质量和个体生活质量构成的分析框架,以此能够对相关政策制度做出回应,也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强调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环境因素对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此分析框架,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建立了解释模型,考察相关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首先阐明生活满意度的概念并构建分析框架,然后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并进行国际层面和历史层面的比较。这里实证分析的核心是建立生活满意度的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层次模型。本文最后将讨论实证发现并探讨其在学术和政策方面的启示。

## 一、生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

不同于收入、教育、健康等客观指标,生活满意度从主观感受和体验的角度测量人们的生活福利和生活质量。英文文献中,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术语包括“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和“幸福感”(happiness)。“主观福利”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表示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身心以及生活环境的各种评估(Diener, 2006)。迪纳等(Diener & Biswas-Diener, 2003; Diener, 2006)将“主观福利”分解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生活满意度,指对生活总体的评价以及对生活具体方面,比如婚姻、工作、收入、住房和休闲的评

价;(2)情绪,包括正面的情绪如愉悦、满足和负面的情绪如沮丧、愤怒;(3)价值判断,如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抱有成就感,觉得人生是否有意义。“幸福感”的含义则更模糊些,在学术研究中至少有两种用途。一种主要用于测量情绪,比如“你昨天幸福/高兴吗?”这种体验经常是短暂的,处于变化之中的,容易受到先前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另一种既用于测量情绪也用于测量对生活的评估,比如在“总体来讲你觉得你的生活幸福吗?”这种用途下的“幸福感”与“主观福利”非常接近。集合了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学者的独立报告“世界幸福感报告”(Helliwell et al., 2013)就是在第二种框架下讨论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感。

因此,从概念上讲,“生活满意度”是“主观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义的“幸福感”概念中强调对生活评估的部分。相比情绪和价值判断等心理和精神的维度,人们通过思考自己的工作、收入、婚姻、住房、健康等各方面的生活而做出满意度高低的评估,是主观福利的诸多维度中较稳定的一个,也能够更直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促进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改革,从而更具有实践意义。

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在近些年逐渐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到舆情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已有研究指出了生活满意度对于居民福利测量的敏感性,它的作用机制不同于GDP指标,但同样是有有效的测量工具。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 2012)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均GDP的增长代表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平均提高程度,因为经济增长的受益人群通常是占人口少数但拥有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资源的人群。生活满意度指标则可以揭示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变化,尤其是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生活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相比GDP指标,生活满意度是测量人们生活境遇和福利的更为全面和有意义的指标。

现有研究对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概念的测量有着丰富的积累,对收入、家庭生活、健康、就业等因素的影响探讨得也比较深入。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的构建。为什么选取这些影响因素?背后的理论假设和理论关怀是什么?这些因素的内在结构和联系是什么?只有阐明了这些问题,才能确保解释模型的信度和效度。

市场和国家是人们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保障、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的主要途径。这两种途径配置资源的方式、目的及规范价值都有所

不同。在这两种结构性因素之外,人们也从环境中获取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资源,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生态后果,影响了福利的可持续增加。生活满意度高低与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有关。本文着眼于福利获得的不同途径及其作用机制,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根据福利获得的途径,解释维度包括市场、集体(地区/国家)、环境和个体;根据福利的不同获得途径所主张的规范价值,解释维度包括竞争、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使用“集体消费”的概念来表示由地区或国家获得福利的机制以及强调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区别于由市场获得福利的机制以及强调经济回报和竞争的价值取向。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生活满意度分析框架,并将之应用到实证分析中。

### (一)生活满意度与市场因素

收入和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GDP 都是资本和市场的产物,强调经济回报和效益,与之关联的价值取向则是竞争性的。人们不仅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绝对”收入,也通过与他人和过去的比较获得“相对”收入,因此这种“市场竞争”的维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收入作用机制。韦胡文(Veenhoven,1991)基于“需求—满足”的框架,认为人们只有满足了基本的、固有的需求才能够幸福,而收入较高的人可以满足各种基本需要,因而收入与幸福感是正相关的关系,幸福感并不是基于比较的相对感觉。当然,他也指出人类的需求并不会无限增长,所以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遵循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虽然被韦胡文批驳,伊斯特林等人(Easterlin,2001;Easterlin et al.,2012)仍坚持相对的视角,强调物质欲望对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而物质欲望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与个人过往经验的比较和与他人的社会性比较。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这两种因素的重要性有所区别。伊斯特林(Easterlin,2001)解释了为什么收入显著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却相对稳定。在他看来,在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收入并非导致生活满意度改变的诱因,而是物质欲望这个中介变量在发挥作用——收入的增加使物质欲望相应增强,而物质欲望的增强会抵消收入增加对生活满意度的正面效应。

国内学者使用中国的数据为这些争论提供了实证证据。邢占军(2011)通过对六个省会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人收入对幸福感

仅有微弱的影响。相对来讲,较不富裕地区的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程度较强。官皓(2010)将绝对收入操作化为前一年的收入,相对收入操作化为对自身收入水平的评价,使用北京、上海、广东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而绝对收入影响不显著。但是罗楚亮(2009)分析全国调查数据则发现,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影响。

美国著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2014)对43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当前的生活满意度比2007年有了大幅度增长,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生活满意度增长显著。其研究也强调绝对收入的效应,不管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高收入阶层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满意度。

## (二)生活满意度与集体消费

与强调经济回报和竞争的市场因素不同,集体消费服务于公共利益,消费品的生产目的不在于追求利润,而是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消费过程只能由“集体”进行组织和管理,其经济和社会功能主要通过国家机构实现(Castells,1976,1977)。王宁(2014)依据消费品供给单位的不同,将集体消费进一步区分为社区/城市消费和社会消费。前者例如公园、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居民凭借其市民身份摄取集体消费资源;后者的消费对象为全国一体化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包括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在集体消费研究中,分配正义和公共服务的质量是学者关注的焦点(Warde,1990)。

集体消费的理论框架强调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为相关的生活满意度研究梳理提供了脉络。伊斯特林等(Easterlin et al.,2012)以中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为例,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收入不平等和失业对于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并认为这也是东欧转型国家生活满意度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生活满意度逐渐上升,主要归功于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阿普尔顿和宋丽娜(Appleton & Song,2008)分析了中国城镇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医疗保险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享受大病保险(个人承担一部分)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享受国家医疗保险的人。

张海东等(2012)使用“社会质量”的研究框架,强调社会关系的质量对于提高人们的福利和潜能的重要作用,其中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袁浩、马丹(2011)依据此研究框架分析了上海市区的调查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维度和人口特征的情况下,社会质量的因素对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受具有显著影响。

分配制度是否公平与公正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布罗克曼等(2014)关注1990-2000年间中国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的诱因。其实证分析指出,经济不满是抑制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内在机制则是收入不平等——虽然这期间人们的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低于国民收入平均水平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使得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导致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消除这种现象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2003-2010年间中国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2003年以来的贫富差距总体高于经济增长初期的1990-2003年间(具体可参见李培林、朱迪[2015]对1982-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的总结)。如果说经济增长初期主要是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人群生活满意度较低的话(Easterlin et al., 2012;布罗克曼等,2014),在2003年以后,当经济发展步入成熟期,区分生活满意度高低的分界线可能是在高收入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李培林、朱迪(2015)的实证分析显示,控制了年龄、社会保障状况、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之后,只有高收入者对于未来生活水平的预期显著乐观,而中等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生活预期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这种生活满意度差异的内在机制则是收入不平等。高收入者和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意味着机会不平等,而由教育不公平带来的社会流动凝固强化了机会不平等(李春玲,2014)。由这种收入不平等支撑的经济发展伤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 (三)生活满意度与环境因素

环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适应理论”认为,人们在生理或者认知方面会适应周围的环境,因而对环境的反应不会那么敏感,因此环境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定显著(Hackney et al., 1976;Evans et al., 1982)。

更多学者认同环境问题的负面效应。一部分研究以健康为关键路

径,指出环境问题会引发多种疾病,从而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Welsch, 2006)。另一部分研究强调环境的独立影响,人们对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及其后果的关心给生活满意度带来显著负效应,并且这种影响独立于健康因素。这部分文献强调主观环境意识的重要影响,如果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比较冷漠,即使污染再严重也不会影响对生活的评价。比如费勒卡波纳等(Ferrer-i-Carbonell & Gowdy, 2007)对英国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居住地的环境状况、居住地区、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之后,人们对臭氧污染的关心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而且在控制了客观环境污染以后,环境关心对生活满意度仍具有显著影响。麦克卡隆与莫拉同(MacKerron & Mourato, 2009)采集了400位伦敦居民家中的空气质量数据,并让居民对居住社区的空气污染是否严重做出评价,结果发现客观测量和主观感受的空气污染水平都对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即使控制了诸多其他变量,结果也是如此。

由于环境对人类福利和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倡导环境消费(对于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人类福利之间的平衡。追求人类福利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但是最小化其对环境的影响、提高环境利用效益才是使福利具有可持续性的路径,这被称作“主观福利的环境效率”(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ll-being)(Dietz et al., 2009)。这种考虑环境影响的“可持续福利”理论框架对于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相关政策建议都有重要启示。

#### (四)生活满意度与个体生活质量

在探讨生活满意度时,个体生活质量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它不同于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而是以重要生命事件的形式影响人们对生活的评估。其中,健康和失业的影响最为重大。杜兰等(Dolan et al., 2008)通过分析1990年以来经济学类期刊发表的论文发现,尽管学术界对于主观福利的影响因素未形成共识,研究发现甚至有所冲突,但是对健康和失业的显著影响却能够达成共识,这一发现还得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不同数据和不同研究方法的证据支持。

阿普尔顿和宋丽娜(Appleton & Song, 2008)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对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认为自己“非常不健康”的人只有14%的概率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或者非常满意,而认为自己

“非常健康”的人有 44% 的概率对自己生活感到满意或者非常满意。该研究的解释是人们身体不健康会造成心情沮丧,而且健康问题也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给生活满意度带来负面效应。

迪纳(Diener & Biswas-Diener,2002)发现大多数现有研究都指出,即使控制了收入因素,失业人群的幸福感和明显偏低。其文章将此诉诸于文化机制,因为没有工作使人们缺乏成就感,而且也经常不被尊重,尤其在男性中更显著。学者在构建生活满意度分析模型时,常常忽略失业及其伴随的压力的影响,或者简单地使用是否有工作来测量失业,但是没有工作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下岗失业,也可能由于个人原因放弃就业,因而削弱了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比如,官皓(2010)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就发现,是否有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提醒本文在分析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时,应当慎重选择测量指标。

### (五)分析框架的构建

按本文的框架,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解释维度包括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和个体生活质量。其中,市场竞争因素主要由绝对收入、相对收入 and 经济发展水平构成;集体消费因素主要由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构成;环境因素主要由客观环境质量和主观环境评价构成;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因素主要由健康状况和就业状况构成。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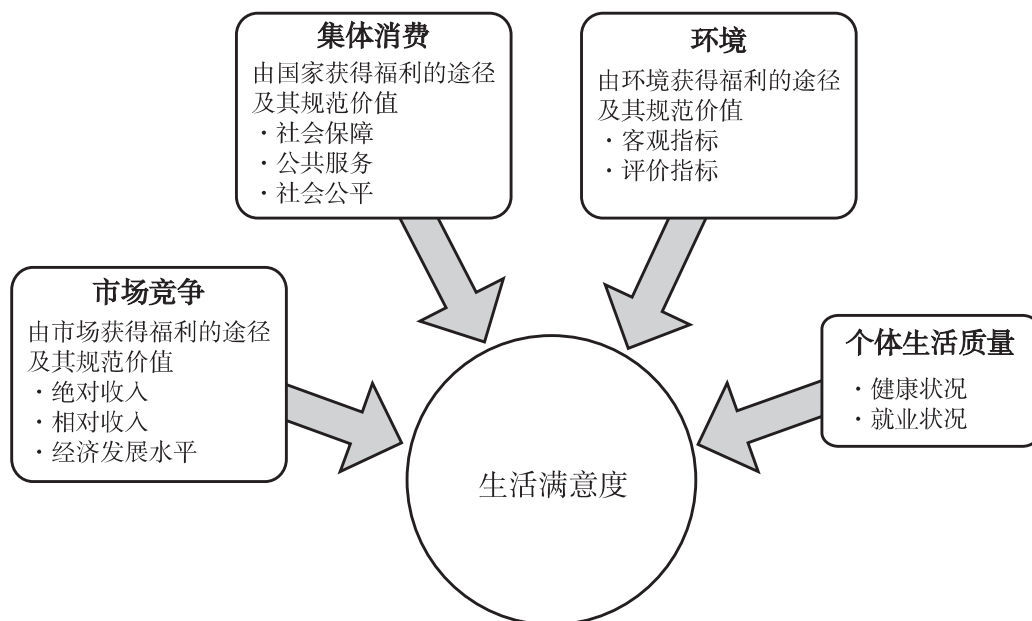


图 1 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上述分析框架能够较为系统地解释生活满意度差异,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分析的可靠性。在实践层面,该分析框架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较可靠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在技术层面,只有在较完整的分析框架下,才能减少误差的影响,从而较准确地解释相关因素的效应。

## 二、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及比较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文中简称“CSS2013”)。该调查使用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覆盖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区域,抽样设计基本保证数据能够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地区,调查对象为18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2013年数据的有效样本为10206个。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差异较大,比如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运行与城镇地区有较大差异,即使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都显著,但作用机制可能有所区别。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聚焦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研究。

数据中有一组问题测量生活满意度,先是询问了被访者对于教育程度、健康情况、社交生活、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休闲娱乐的满意度,最后询问了总体满意度。被访者为满意程度打分,范围为1至10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10分为“非常满意”。城镇居民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平均为6.84分。居民较高的满意度来自家庭关系、社交生活和健康状况,均值分别为8.26、6.99和6.95分,都高于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而较低的满意度来自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休闲娱乐,均值分别为5.66、5.81和5.83分。

我们以总体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各方面的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来构建回归模型。模型总体是显著的,能够解释56.2%的总体满意度变异,各组成部分也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于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重要,可见在这个测量框架中,较优越的物质条件是提升城镇居民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此外,休闲娱乐和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是第二重要的因素,相对而言社交生活、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满意度的影响较弱。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 2014)进行的类似调查发现: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大都对生活水平或工作等反映经济状况的指标较不满意,但是对家庭和朋友等个人生活领域较满意,并且物质条件的满意程度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最重要的正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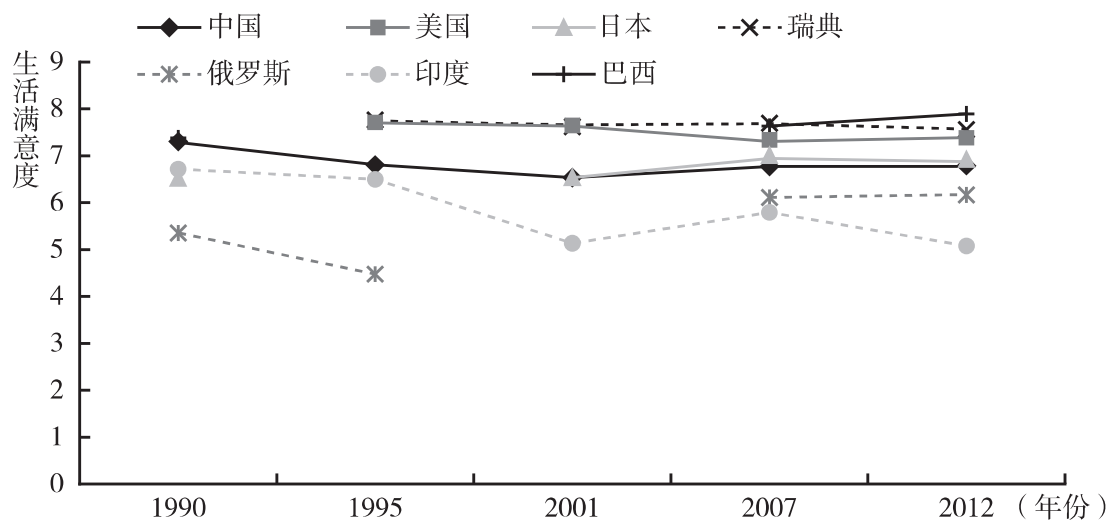
在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所著的“世界幸福感报告”(Helliwell et al., 2013)中,中国人在2010-2012年间的幸福感均值为4.978(10分制),在156个国家中排在第93位,比2005-2007年间的幸福感均值增加0.257。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2012年中国居民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均值为6.85(10分制),在58个国家中排在第31位,比2005-2009基期的第36位有所上升。

刘军强等(2012)并不认同传统的“幸福悖论”假说(Easterlin, 1974)。他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强调国民的幸福感在2003-2010年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以5分制的幸福感得分计算,中国人2003年的幸福感均值为3.27分,2010年上升至3.77分;如果“幸福”和“非常幸福”重新组合为“幸福”,“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重新组合为“不幸福”,自感幸福的人的比例从2003年的37.3%上升到2010年的72.6%,自感不幸福的人的比例从2003年的12.9%下降到2010年的9.8%。

我们也将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同金砖国家、主要发达国家和福利水平较高的北欧国家做了比较。如图2所示,中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美国、瑞典这两个发达国家和高福利国家的代表,在2001年后也低于日本。但是就趋势而言,美国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在2001年以后呈下降趋势,而我国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在2001年以后基本呈上升趋势。巴西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处于与美国和瑞典相当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和俄罗斯的生活满意度则处于较低水平。

国际比较既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反映了福利、价值观、社会稳定等影响机制。虽然美国受经济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等因素影响,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但仍然以较强的经济和福利体系保障了国民总体较高的生活水平,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与高福利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巴西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同其文化和价值观有关,拉美国家的居民更倾向于正面的目标和情绪(Diener & Biswas-Diener, 2003);而俄罗斯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可能主要同前苏联崩溃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收入下降和信仰崩溃有关(Inglehart & Klingemann, 2000; Diener & Seligman, 2004)。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俄罗斯的生活

满意度已经有很大提高。国际比较揭示了生活满意度的复杂机制,我国国民生活满意度能否保持 2001 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对相关制度改革提出了挑战。



注:横轴为中国的调查年份,各国的具体调查年份基本在正负两年之内。纵轴为生活满意度量表,1 = 非常不满意,10 = 非常满意。

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在线数据分析(<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ONline.jsp>)。

图 2 中国与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生活满意度比较

### 三、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从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个体生活质量四个维度解释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并控制相关的人口学变量。首先我们构建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不同维度对于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受到自身所处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受到所处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常规线性模型分析嵌套数据时有很大局限性。如果使用传统的个体层次模型,将高层次特征的变量放在个体层次分析,则会因为高层次变量之间的同质性而违背统计估计中的基本假定(劳登布什、布瑞克,2007;卢克,2012)。此外,引入地区层次变量可以包括更多客观指标,比如社会保障水平、环境质量,而这些变量在个体层次无法获得。因此,本文也将构建多层次模型,考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下文将解释各自变量的定义。

在市场因素中,本文选择使用家庭收入来测量绝对收入,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机会不仅受到个人收入的影响,也受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收入的影响,因而家庭收入能够较准确地测量一个人所获得的经济福利。此外,由于被访者对共同收支的家庭成员衡量标准比较模糊,使得家庭人口数的误差较大,导致家庭人均收入的计算经常不准确,故本文使用家庭总收入测量被访者拥有的绝对收入。

在相对收入的测量指标方面,由于缺乏追踪数据,无法获得家庭收入的客观变化,但是调查询问了被访者与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在本地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可以近似测量纵向相对收入(与自己过去相比)和横向相对收入(与周围人相比)。现有研究通常使用两种方法测量与他人比较的相对收入:一种是客观测量法,例如以同等受教育水平、同一年龄段或者同一收入区间的人群平均收入为参照,比较个体与参照水平之间的差距;另一种是主观判断法,让被访者主观选定一个参照体系并给出相对收入水平。官皓(2010)主张主观判断法,因为任何客观指定的参照体系都难以精确反映受访者关于其自身相对收入地位的主观感受。“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的层次”这个变量中虽然“本地”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允许被访者指向自己认为的社会关系所及的地域和参照体系,因而更适合作为横向相对收入的测量指标。官皓(2010)也进一步使用了不同的客观参照体系定义下的相对收入来建模,验证了主观判断的相对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

在集体消费的维度上,本文主要关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三个方面。根据已有研究,医疗保险是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样本中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并且医疗保险的分类<sup>①</sup>并不指向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所以医疗保险的客观指标无法较可靠地测量社会保障水平。相比较而言,主观指标“对医疗保险的满意度”是测量社会保障水平较合适的变量。公共服务涉及日常的衣食住行诸多方面,由于社会保障的测量覆盖了医疗卫生,本文选择“住房保障”这个标志民生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使用被访者对于相关政府工作的评价来测量公共服务水平。关于公平的问题,公众和学界最为关心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因此本文用被访者评价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公平程

---

① 问卷中医疗保险的类型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即新农合)和其他。

度测量社会公平程度。

在环境的维度上,本文使用被访者对目前居住地环境状况的满意度来测量。关于个体生活质量,本文主要关注健康和失业的因素。数据中缺乏直接测量健康状况的变量,但是有一组测量生活压力的变量,其中“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的变量细化了健康对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可以较准确地测量健康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此变量从经济压力的角度来考察健康因素的影响。失业问题也被很多文献指出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前文提到,简单使用有无工作的变量来解释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并不恰当,并且根据现有数据也很难分离出真正的“失业人员”。同健康因素的测量方法一致,本文使用有无“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的压力测量被访者或家人所面临的失业风险,这种明确的“压力—满意度”的理论假设能够较准确地测量失业带来的影响。

控制变量选择了已有研究中常用的一些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和受教育水平。考虑到年龄与生活满意度可能呈 U 型关系,模型中也加入了年龄平方项。基于制度和文化的因素,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可能对生活满意度有影响,并且与城乡户口可能有交互作用,因而将户口类型区分为是否本地人和是否城镇户口的四分变量。在宏观层次上,加入的解释变量为所在省的人均 GDP、医保覆盖率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测量市场、集体消费和环境维度。进入模型的变量及其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本文对家庭总收入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以减少模型出现共线性和异方差的风险。

**表 1** 模型包含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层次				
生活总体满意度	1 - 10, 1 = 非常不满意, 10 = 非常满意	5574	6.842	1.819
去年家庭总收入(元)	0 - 10100000	4083	76820.430	197255
去年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	4.277 - 16.130	4055	10.817	.934
与五年前相比的生活水平变化	1 = 下降很多, 2 = 略有下降, 3 = 没变化, 4 = 略有上升, 5 = 上升很多	5542	3.726	.950

续表 1

变量	变量值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属于哪个层次自评	1 = 下层, 2 = 中下层, 3 = 中层, 4 = 中上层, 5 = 上层	5490	2. 357	. 893
医疗保障满意度	1 - 10, 1 = 非常不满意, 10 = 非常满意	5278	6. 553	2. 371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政府工作评价	1 = 很不好, 2 = 不太好, 3 = 比较好, 4 = 很好	4467	2. 406	. 786
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1 = 非常不公平, 2 = 不太公平, 3 = 比较公平, 4 = 非常公平	5171	2. 149	. 732
居住地环境状况满意度	1 - 10, 1 = 非常不满意, 10 = 非常满意	5582	6. 250	2. 009
医疗支出大, 难以承受的压力	0 = 无, 1 = 有	5549	. 278	. 448
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的压力	0 = 无, 1 = 有	5556	. 289	. 453
性别	1 = 男, 2 = 女	5583	1. 542	. 498
年龄	18 - 72 岁	5583	43. 554	13. 600
婚姻状况	0 = 单身(未婚、离婚或丧偶), 1 = 已婚(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或同居)	5575	. 816	. 387
受教育程度	0 = 未上学和小学, 1 = 初中, 2 = 高中、中专和职高, 3 = 大专, 4 = 本科及以上	5575	1. 553	1. 261
户口性质	1 = 城镇本地户口, 2 = 城镇外地户口, 3 = 农村本地户口, 4 = 农村外地户口	5562	2. 111	1. 132
省级层次				
人均 GDP(万元)	2. 315 - 10. 011	5583	5. 054	1. 904
医保覆盖率	. 559 - 1	5583	. 871	. 046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 419 - 164. 497	5583	81. 560	39. 011

### (一) 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我们将生活总体满意度作为连续的结果变量, 使用线性回归模型,

在解释变量中依次引入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和个体生活质量因素,考察模型解释力和自变量的变化。该模型也进行了对年龄和性别的加权,使得样本更符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和性别分布。线性回归模型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从只有绝对收入的模型 1 到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 6 都是显著的,而且模型所能够解释的生活满意度变异也是依次递增的。

首先引入家庭总收入来测量绝对收入,模型 1 能够解释 3.7% 的生活满意度变异,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家庭收入越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模型的估计使用了调整的 R 平方,随着变量的引入,可以考察模型的解释力变化。然后引入相对收入变量,即与自己过去比较和与周围人比较的经济状况。结果显示,绝对收入依然显著,相对收入的两个测量指标都显著,生活水平提高得越多对生活越满意,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模型 2 的解释力明显提高,能够解释 17.2% 的生活满意度差异,说明相对收入对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非常重要。

模型 3 引入了测量集体消费的 3 个变量,分别测量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模型的解释力再次显著提升,比只包含市场竞争因素的模型提高了 9% 的解释力,原有的市场竞争因素保持显著,新引入的集体消费因素也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对医疗保障越满意、对住房保障的政府工作评价越高、认为收入分配越公平,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模型 4 引入了测量环境因素的变量,我们看到对居住地的环境满意度越高,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也越高,而且差异显著。引入环境因素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能够解释 29.6% 的变异。模型 5 加入了个体生活质量因素,分别从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就业压力来测量,其影响都是显著的,有医疗支出的压力、有家人无业或失业的压力都给生活满意度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本文使用的包括市场和非市场因素(集体消费、环境和个体生活质量)的模型能够解释近 31% 的变异,并且模型的解释力随着引入变量的增加而增加,说明这些因素对于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模型结果也说明了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模型 6 包含了所有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解释力提升至 33%,所有解释变量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除了户口类型,控制变量中的

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都显著。女性比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已婚或有伴侣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居民都比受教育程度为未上学或小学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高。年龄与生活满意度呈U形关系,经过计算,年龄效应的临界点在41岁,基本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门槛。随着这一门槛的临近,压力逐渐增加,生活满意度也逐渐降低;而迈过这一门槛,随着经验财富的积累和家庭事业的稳定,生活满意度又逐步回升。人口特征的影响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如 Appleton & Song, 2008; 官皓, 2010; 刘军强等, 2012)。

表 2 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市场竞争因素: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						
家庭总收入自然对数	.376 *** (.033)	.183 *** (.032)	.257 *** (.038)	.266 *** (.037)	.215 *** (.037)	.163 *** (.039)
与过去比的生活水平变化		.409 *** (.034)	.305 *** (.035)	.276 *** (.035)	.252 *** (.035)	.250 *** (.035)
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517 *** (.035)	.420 *** (.039)	.377 *** (.038)	.323 *** (.038)	.290 *** (.038)
集体消费因素: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						
医疗保障满意度			.147 *** (.015)	.120 *** (.014)	.109 *** (.015)	.107 *** (.014)
住房保障政府工作评价			.272 *** (.040)	.204 *** (.040)	.198 *** (.040)	.198 *** (.040)
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260 *** (.043)	.209 *** (.043)	.191 *** (.043)	.207 *** (.043)
环境因素:环境评价						
居住地环境满意度				.188 *** (.017)	.182 *** (.017)	.178 *** (.017)
个体生活质量:健康和就业						
医疗支出大的压力					-.387 *** (.073)	-.417 *** (.073)
家人无业失业的压力					-.310 *** (.073)	-.237 *** (.072)



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女性						.152 <sup>***</sup> (.056)
年龄						-.081 <sup>***</sup> (.016)
年龄平方						.001 <sup>***</sup> (.000)
已婚						.307 <sup>***</sup> (.090)
受教育程度(以未上学和小学为参照)						
初中						.127 (.093)
高中中专和职高						.292 <sup>***</sup> (.105)
大专						.509 <sup>***</sup> (.118)
本科及以上						.655 <sup>***</sup> (.124)
户口类型(以农村外地户口为参照)						
城镇本地						.040 (.098)
城镇外地						-.002 (.139)
农村本地						.071 (.103)
常数	2.748 <sup>***</sup> (.368)	2.108 <sup>***</sup> (.347)	-.262 (.422)	-.864 <sup>**</sup> (.418)	.276 (.438)	1.746 <sup>***</sup> (.558)
样本量	4049	3980	3038	3037	3018	3001
R <sup>2</sup>	.037	.172	.257	.296	.309	.329

注:(1)括号里是稳健的系数标准误。(2)\* p < 0.1, \*\* p < 0.05, \*\*\* p < 0.01。

## (二) 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多层次模型中,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变,在已有的个体层次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所在省的人均 GDP、医保覆盖率和二氧化硫排放

量指标,分别测量宏观层次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保水平和环境质量。已有文献强调环境意识和环境认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因此,多层次模型既考虑客观环境质量的独立影响,也考虑客观环境质量通过主观环境评价产生的间接影响。具体到本模型中,所在省的环境质量不仅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截距效应),也可能与个体的环境满意度存在交互效应,即所在省的环境质量通过个体的环境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个体的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的斜率则被处理为随机的。由于省级层次变量引入了医保覆盖率作为宏观层次的社会保障指标,为了模型简约起见,去掉了个体层次测量同样指标的医疗保障满意度。模型如下所示:

### 1. 虚无模型

$$Y_{ij} = \beta_{0j} + r_{ij}$$

若将  $\beta_{0j}$  分解为固定成分和省级层次的随机成分,混合效应的方程为:

$$Y_{ij} = \gamma_{00} + u_{0j} + r_{ij}$$

虚无模型中随机截距方差为 0.083,经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为 0.03,也就是说在不加入任何解释变量的情况下,个体生活满意度差异的 3% 源于不同省之间的差异。对省级方差的卡方检验在 0.01 的水平显著,说明生活满意度可以由个体和省级层次的变量来解释。

### 2. 多层次模型: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

个体层次模型:

$$Y_{ij} = \beta_{0j} + \beta_{1j}X_{1ij} + \beta_{2j}X_{2ij} + \beta_{3j}X_{3ij} + \beta_{4j}X_{4ij} + \beta_{5j}X_{5ij} + \beta_{6j}X_{6ij} + \beta_{7j}X_{7ij} \\ + \beta_{8j}X_{8ij} + \beta_{9j}X_{9ij} + \beta_{10j}X_{10ij} + \beta_{11j}X_{10ij}^2 + \beta_{12j}X_{12ij} + \beta_{13j}X_{13ij} + \beta_{14j}X_{14ij} + r_{ij}$$

其中,  $\beta_{nj}$  ( $n = 0, 1, \dots, 14$ ) 是个体层次的回归系数,  $X_{nij}$  是个体层次的省份  $j$  个体  $i$  的自变量,分别对应家庭收入自然对数、与过去相比的生活水平变化、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住房保障政府工作评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居住地环境满意程度、医疗支出压力、家人失业压力、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类型。 $r_{ij}$  是个体层次的省份  $j$  中个体  $i$  未被解释的残差。

省级层次模型: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W_{1j} + \gamma_{02} W_{2j} + \gamma_{03} W_{3j} + u_{0j}$$

$$\beta_{6j} = \gamma_{60} + \gamma_{61} W_{3j} + u_{6j}$$

$$\beta_{ij} = \gamma_{i0} \quad (i = 1, 2, 3, 4, 5, 7, 8, \dots, 14)$$

其中,  $\gamma_{00}$ 、 $\gamma_{01}$ 、 $\gamma_{02}$ 、 $\gamma_{03}$  是省级层次的回归系数,  $W_{1j}$ 、 $W_{2j}$ 、 $W_{3j}$  是省级层次的省份  $j$  中的解释变量, 分别对应人均 GDP、医保覆盖率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u_{0j}$  是城市层次的残差,  $\gamma_{61}$  表示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环境满意度的交互作用。

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与虚无模型相比, 多层次模型在拟合程度上有很大的提高。模型的随机截距方差为 0.025, 相比虚无模型的 0.083, 该模型可以解释 69.88% 的不同省份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

表 3 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次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个体层次变量		
家庭总收入自然对数	.138 ***	.035
与过去比较生活水平的变化	.277 ***	.031
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331 ***	.035
住房保障政府工作评价	.247 ***	.036
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233 ***	.039
居住地环境满意度	.217 ***	.036
医疗支出大的压力	-.464 ***	.063
家人无业、失业的压力	-.228 ***	.064
女性	.0951 *	.055
年龄	-.0756 ***	.015
年龄平方	.001 ***	.000
已婚	.308 ***	.087
受教育程度(以未上学和小学为参照)		
初中	.037	.082
高中中专和职高	.202 **	.094
大专	.404 ***	.118
本科及以上	.545 ***	.124
户口类型(以农村外地户口为参照)		
城镇本地	.0706	.097
城镇外地	-.004	.139
农村本地	.136	.097

续表 3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省级层次变量		
人均 GDP(万元)	.065 ***	.020
医保覆盖率	.160	.692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005	.003
二氧化硫排放量 × 居住地环境满意度	-.000	.000
截距	1.341 *	.813

注: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我们看到,个体层次变量的作用与线性回归模型保持一致,省级变量中只有人均 GDP 具有显著影响。生活在人均 GDP 越高、越富裕的省份,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明显越高。医保覆盖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同各省的医保覆盖率普遍较高有关。二氧化硫排放量通过居住地环境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并不显著。但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的独立影响在多层次模型中依然显著。分析揭示,环境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感受和评估。有关主观环境满意度独立影响的意义,本文的分析发现与现有研究一致(参见 Ferrer-i-Carbonell & Gowdy, 2007; MacKerron & Mourato, 2009)。该发现既说明了环境意识和环境关心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环境治理的复杂性,污染物排放不仅关系到健康和生态,也是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的就业、收入乃至生活方式的问题。正是这种主观性较强的关系提醒政府和公众应当守住环境治理的底线,重视环境问题,不能因为空气污染持续或者难以治理而变得麻木、被动。

### (三)对分析发现的讨论

以上分析发现证实了市场竞争因素对于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仍具有重要作用。生活在越富裕的地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明显越高,而且居民绝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但是,随着收入差距比例的缩小,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这也回应了另一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是抑制人们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将在后文详述)。如果将绝对收入的差异当作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那么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对生活满意度的效应趋弱。市场因素对于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较快增长的背景,与有关新兴市场国家

的研究发现一致(Pew Research Centre, 2014)。这也印证了迪纳等(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所论及的社会富裕程度是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效应的调节变量。同样,在一个社会内部,收入水平也是收入效应的调节变量——收入效应在高收入群体中较弱。

比起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重要(能解释更高比例的生活满意度差异),与已有的国内实证研究一致(罗楚亮, 2009;官皓, 2010;刘军强等, 2012)。就相对收入的指标来看,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变量的回归系数更大,说明与周围人比较而产生的优越感更能提升生活满意度。模型6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本地社会经济地位自评每上升1个等级,比如从中下层上升到中层,生活满意度得分将提升0.29分。

分析结果凸显出集体消费和环境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引入这两方面的变量之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13%。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影响显著。假设居民A的评价是非常不公平,居民B的评价是比较公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居民B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将高出0.414分,这反映出收入不平等是抑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由于这种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机会不平等,削弱了人们对自致性成功的认同,也造成人们对使用合法性手段实现目标不抱信心,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信心和幸福感(相关解释参见张海东, 2012;袁浩、马丹, 2011)。社会保障提升居民生活的安全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的程度。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平的条件,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集体消费的作用机制不同于收入增长带来的满足感和优越感的增强,但同样会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全国各地雾霾、自来水污染等气候和环境事件的频繁出现,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根据调查数据进一步分解了居民对当地环境状况的满意度,回归分析显示,对日常生活卫生环境评价的影响最大,其次对是空气污染评价的影响。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层次模型显示出居住地环境满意度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一个对于当地环境比较满意的居民(假设打9分),比一个对于当地环境状况比较担忧的居民(假设打2分),在其他经济、社会、生活质量和人口特征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于环境状况较满意的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将高出1.246分。即使引入客观的环境质量指标,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的影响

仍保持显著。进一步将表2中模型6的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后,结果显示在四个维度的解释变量中,环境满意度的标准化系数最高,说明相比市场竞争、集体消费和个体生活质量因素,人们对环境的主观评估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

#### 四、总结和启示

本文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构建生活满意度的分析框架,二是在此框架下对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依据福利获得的途径及其所主张的规范价值,本文提出了一个由市场竞争、集体消费、环境和个体生活质量因素组成的生活满意度分析框架,以此较系统地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有助于理解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变化趋势,也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稳健性。城镇居民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平均为6.84分,属于比较满意的程度。实证分析揭示了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相比较而言,与自己过去比较和与周围人比较的相对收入更为重要。分析强调了集体消费和环境的重要性。由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构成的集体消费因素对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公众关注。分析表明,居民对于当地的环境状况满意度越高,对于生活的总体认知越满意,而且差异显著;即使引入客观环境指标,环境满意度的影响依然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卫生环境和空气质量对于环境满意度的影响最重要。用医疗支出压力和家人失业、无业压力来测量的个体生活质量因素也具有显著负效应。

分析发现虽然指出了“钱很重要”,即经济发展和收入对于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但是也强调“有钱未必就幸福”,生活满意度同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平和环境治理也有显著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人们的温饱需求满足之后,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要求,如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优质的教育和廉洁高效的政府。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迫切需要将发展模式由GDP主导调整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推进相关制度政策的改革,才能保持生活满意度的平稳上升,“留住人心”。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sup>①</sup>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发展目标落实到“人”的具体福利，强调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和“平安中国”，其实质就是改善生态环境、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民福利的可持续提高。

本文的分析发现对于可持续消费的研究也有一定启示。已有研究和本文的实证分析都表明，依赖市场交换的个体消费的持续增长并不会带来主观福利的显著增加；可持续消费行为反而会丰富内心体验和带来成就感，从而增加主观福利（Jacob et al., 2009）。这就给可持续消费的原则和途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减少消费或者改变消费模式是可取的，可以减少生态破坏而不损失人们的主观福利（林托特，2013）。有了这种合法性基础，政府可以有效鼓励绿色消费，既有利于生态平衡，又可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带动经济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生活满意度是评估生活质量的重要工具，但它不能取代客观的评估指标，比如 GDP、收入、工作等。有些身处贫困的人群也能够体会到幸福，但仅仅停留在一种情绪体验，并不能上升到生活质量。正如客观的经济社会指标不足以代表社会的福利，主观福利的指标也不足以代表有质量的生活（OECD, 2013; Diener & Biswas-Diener, 2003）。

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当整个社会已经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人们对于市场竞争因素的关注将会下降，会更加关注公平、权利和环境宜居等因素。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更取决于后者。这一趋势在中产阶级当中更加明显。这一假设对于我国相关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具有重要启示，将来可以围绕它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布罗克曼, 希尔克、简·德尔海、克里斯蒂·韦尔泽、袁浩、许峰, 2014, 《中国困惑: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背离》, 《国外理论动态》第 5 期。
- 官皓, 2010,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 《南开经济研究》第 5 期。
- 劳登布什, 史蒂芬、安东尼·布瑞克, 2007, 《分层线性模型: 应用与数据分析方法》, 郭志刚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春玲, 2014,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 - 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

---

<sup>①</sup>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5-11/04/c\\_128392424\\_3.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5-11/04/c_128392424_3.htm) (访问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5 日)。

- 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培林、朱迪,2015,《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林托特,约翰,2013,《可持续消费与可持续福利》,埃德温·扎卡伊编,《可持续消费、生态与公平贸易》,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卢克,道格拉斯,2012,《多层次模型》,郑冰岛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 罗楚亮,2009,《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第11期。
- 王宁,2014,《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袁浩、马丹,2011,《社会质量视野下的主观幸福感——基于上海的经验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 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2012,《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第3期。
- Appleton, Simon & Lina Song 2008,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 *World Development* 36(11).
- Castells, Manuel 1976,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In C. G. Pickvance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Diener, Ed 2006,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Indica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7.
- Diener, Ed & Robert Biswas-Diener 2002,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 to Needed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
- 2003, "Finding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mpower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Measuring Empowermen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World Bank i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4-5, 2003.
- Diener, Ed & Martin E. P. Seligman 2004, "Beyond Money: Toward an Economy of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1).
- Dietz, Thomas, Eugene A. Rosa & Richard York 2009, "Environmentally Efficient Well-Being: Rethinking Sustainability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Well-Be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Human Ecology Review* 16(1).
- Dolan, Paul, Tessa Peasgood & Mathew 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
- 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a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P. A. & Reder M. W.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u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
- Easterlin, Richard A., Robson Morgan, Malgorzata Switek & Fei Wang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 –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5).
- Evans, Gary W., Stephen V. Jacobs & Neal B. Frager 1982, “Adaptation to Air Pollu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2).
- Ferrer-i-Carbonell, Ada & John M. Gowdy 2007,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appiness.” *Ecological Economics* 60.
- Hackney, Jack D., William S. Linn, Ramon D. Buckley & Helen J. Hislop 1976, “Studies in Adaptation to Ambient Oxidant Air Pollution: Effects of Ozone Exposure in Los Angeles Residents vs. New Arrival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8.
- Helliwell, John, Richard Layard & Jeffrey Sachs 2013,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 (<http://unsdsn.org/resources/publications/world-happiness-report-2013/>).
- Inglehart, R. & H. D. Klingemann 2000, “Genes, Culture, and Happiness.” In Diener E. & E. M. Suh (eds.),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Jacob, Jeffrey, Emily Jovic & Merlin B. Brinkerhoff 2009, “Personal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Mindfulness Meditati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Personal Quality of Life in a Survey from the 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Move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3.
- Knight, Kyle W. & Eugene A. Rosa 2011,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ll-Being: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0.
- MacKerron, George & Susana Mourato 2009, “Life Satisfaction and Air Quality in London.” *Ecological Economics* 68.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3, “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91655-en>).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People in Emerging Markets Catch Up to Advanced Economies in Life Satisfaction” (<http://www.pewglobal.org/2014/10/30/people-in-emerging-markets-catch-up-to-advanced-economies-in-life-satisfaction/>).
- Veenhoven, Ruut 1991,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
- Warde, Alan 1990,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Sociology* 24(1).
- Welsch, Heinz 2006, “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 Valuation of Air Pollution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Data.” *Ecological Economics* 58.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梅 笑